

邵公文著

从学徒到总经理

——书店生涯回忆



朝華出版社

从学徒到总经理

—书店生涯回忆—

邵公文

朝华出版社

(京)新登字138号

责任编辑：邵捷传

封面设计：孙 杰

从学徒到总经理

——书店生涯回忆

邵公文

朝华出版社出版

北京车公庄西路35号 邮政编码：100044

新华书店经销

顺义县后沙峪印刷厂印刷

350×1168毫米 大32开 8.5印张 211.7千字

1993年9月 第一版 1993年9月 第一次印刷

印数1—1500册 定价：5.00元

ISBN7—5054—0366—4/G0.0084



(吴印咸 摄)
作 者 像



邵公文与1931年9月18日与同时参加生活周刊社的老同志在一起（自右至左：邵公文、张锡荣、杜国钧（谷军）、薛迪畅）



1986年邵公文在日本



邵公文与部分三联书店的同志们在一起
(1982年12月17日摄于上海韬奋纪念馆)



邵公文与夫人、子女在一起
——1986年摄于北京家中——



邵公文与部分老同志在一起
——自右至左：薛迪畅、张锡荣、邵公文、黄慧珠，
杜国钧、曹建飞、刘港——
(摄于1993年5月11日北京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
召开的祝寿会上)

前 言

这里收集的文稿,大部分是1982年底我离休后写的回忆文章,也有一些50年代写的材料。

我14岁(1927年)开始,当了4年学徒。从1931年9月18日考进生活周刊社到1982年离休,这整整半个世纪,一直都工作在文化出版事业的岗位上。这半个世纪,又正是我们祖国与人民遭受了日本帝国主义入侵和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危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最终建立了新中国的历史大转变时期。在这曲折变化的几十年中,我自己先是得到韬奋先生等的培养教育,后又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先后辗转于华东到西北,华中到西南,又去东北,在十几个城市开展进步图书出版发行工作。新中国建立后又继续为发展新中国的图书出版发行事业和开拓国际图书贸易,工作了30多个年头。这半个世纪来,我经受过多方面的锻炼与考验,至今已是80岁的老人了。回忆自己一生曲折奋斗的经历,虽然做了一些工作,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因个人和历史的局限,也有不少错误、挫折和教训。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期的书店工作,有一些过左的政策,现在看来很值得反思。

今年初,子女们商量怎样祝贺我80岁生日,他们一致赞同把我以前写过的材料搜集起来出一本书。这样,可以留下一点历史事实的资料,可供有关同志做研究参考,后人看看也能从中得到一点知识,懂得一些做人的道理。孩子们还热心凑了一笔钱作出书之用,这就是这本书的由来。

至于书的内容,包括:(一)我自己的书店生涯;(二)回忆30年代以来生活书店与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三)纪念

我的领导和战友；（四）应上海古旧书店毕青同志约请为《古旧书讯》写的我比较熟悉的几位作家和他们写的书。

由于年岁已大，记忆力差，有些人和事已记不太清，不妥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谢谢帮助此书顺利出版的同志们！

邵公文

1993年6月

目 录

前言	(1)
----	-------

(一)

我的学徒生涯	(1)
考进生活周刊社	(5)
在生活周刊社的工作与学习	(7)
30年代上海生活书店的批发工作	(11)
苏州部分青年的抗日救亡活动	(16)
上海蒲石路312号	(18)
去延安筹建光华书店和入党	(21)
生活书店贵阳分店开业前后	(26)
重庆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记事	(35)
回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	(48)
去香港	(55)
辗转西南又逢日军入侵湘桂	(58)
抗战胜利后调往东北	(61)
调到北京以后	(73)

(二)

生活书店的创立、成长与发展	
——纪念生活书店50年	(77)
哈尔滨光华书店职工思想总结	(130)
在三联书店第一次全国分店经理会议上的报告	(138)
回忆机械工业出版社的成立	(165)
中国图书发行公司的成立	(166)
在中国国际书店工作24年	(179)

(三)

忆衡老	(186)
编辑出版工作者的楷模邹韬奋	(189)
邹韬奋在苏州	(197)

进步文化出版事业的两先驱

——胡愈之与邹韬奋	(199)
徐伯昕同志与生活书店	(212)
痛悼徐伯昕同志	(225)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记文化战士艾寒松	(227)
张仲实同志在生活书店的日子	(231)
忆毕子桂	(233)
忆念丁玲同志	(238)
悼念王启霖、刘家祥两烈士	(239)

(四)

鲁迅与《革命文豪高尔基》	(250)
费巩和《英国政治组织》	(251)
田汉和《回春之曲》	(253)
平心和生活《全国总书目》	(255)
傅大庆和他翻译的《战争论》	(257)
高滔和《新生代》	(259)
记范长江同志对编辑《韬奋文集》的意见	(260)
后记	(263)

我的学徒生涯

辛亥革命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13年，我出生在苏州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我父亲邵培如原在江苏吴县正仪镇上一个夏布店里当店员，由于天灾人祸，生活难以维持，于1912年携家带口到这人称为“天堂”的苏州来谋生。但“天堂”是不属于普通老百姓的，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贫苦人民的命运，父亲在苏州城里根本找不到他梦想的职业，只能沿街叫卖作小贩谋生，以后才在一家商店里当上了炊事员。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在我上面还有两个姊姊一个哥哥。由于家贫，又因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影响，大姊还未成年就出嫁到苏州农村，二姊十几岁时即因病夭折，而我兄弟俩则得到了享受上学读书的偏爱。

我6岁时，父母送我上私塾，念过《千字文》、《百家姓》之类的书。后来兴新学，1919年，我7岁时又上了小学，那时的小学学制是初小4年、高小3年。我读初小时因病留级一年，1924年才初小毕业。1925年“五卅”运动时，我在高小读书，当时发生了“五卅”惨案，英帝国主义者屠杀中国工人顾正红的消息很快传到了苏州，激起抗议帝国主义暴行的革命运动，当时也波及到苏州的各个学校，我与大家一起参加了游行示威。这时老师上课也讲到，中国地图的形状象“秋海棠”，正在遭到各帝国主义的蚕食。每年都有好几次国耻纪念日，如“五九”、“五四”等等，这次又增加了“五卅”……。这是我有生以来接受的反帝爱国思想的第一课，这在我小小的心灵里，烙下了最初的爱国雪耻的印象。

高小毕业后，因家庭贫困，父母没有力量供我继续上学，但又年幼，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家中呆了将近一年。到1927年春，

北伐军来到之前，父亲又一次失业，在苏州难以生活，我们全家只好又回昆山乡下，暂住在舅舅家中。寄人篱下总不是长久之计，为了谋生，父母亲就托亲求友千方百计为我找工作。同年4月，父亲将我带到上海，正值“四·一二”事变之后，出了火车站，就惊骇地看到沿路都有许多被枪杀的血肉模糊的尸体。后来知道，这正是国民党背信弃义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的罪恶现场的一部分。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目睹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人民的罪证。

在上海，经人介绍，我进了一家钟表店去当学徒。进店时举行了叩头拜师礼，这是我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职业。这个钟表店只是一个单开间门面的小店，还兼营镶牙。有几个修钟表的老师傅，店老板也就是我的师父，他管镶牙。我还有个师兄，也是学徒。我们两人每天干的都是杂活：扫地、上下门板、洗衣、烧饭、抱师母初生的婴儿……。这些活干了一件又一件，没有停歇的空儿，不如师父、师母的意，还要遭训斥。一天下来，既紧张、又劳累，晚上就在店堂的地上打地铺睡觉。可是四壁都挂着许多钟表，一忽儿这只钟咣咣地敲，一会那只钟又咣咣地响，整夜钟声不绝于耳，不能睡个安稳觉。加上吃的菜又都是臭冬瓜、黄泥螺（老板是宁波人）之类，不到一个月我就病了。

病了还不能停止工作，同时老板还让我学镶牙。开始学的唯一手艺是吹镶牙用的金片，就是把一粒黄金放在煤油灯前用嘴吹火，火吹到一定的热度才能在火前把黄金烤软打成薄片，用来包金牙用。这就要用鼻子吸气，同时不停地吹火，由于我体弱，底气不足，无力掌握好这种原始的吹火方法，以致经常挨老板的辱骂。就这样度日如年地苦挨了几个月，我实在受不了，不得不离店回家。

在家里当然不能久呆，父亲又为我四处找工作。到1927年初冬，又经人介绍到上海浙江路先施公司对面弄堂里一家新开的羊

肉粥铺子里去当学徒。老板在一家烟草公司当职员，兼营这个铺子。我又拜他为师，称他为先生。我在这个铺子里除了承担全部杂活外，后来师父还让我帮他管帐，这时我意识到父母苦苦地供我读的书学的数有了用武之地，开始懂得了一点学文化的重要。但是在那种年头里，吃这类羊肉粥的人还是有限的，又有季节性，冬天一过就没有多少人来吃羊肉粥了。老板就把铺子收了，而我刚高兴了几天，就被辞退出门，又一次失业，只能背起铺盖回家。这是我的第二次学徒生涯，也是第二个职业。

后来，好不容易又在亲友的帮助下找到第三个职业。那是在上海北火车站附近，老靶子路俭德储蓄会里的百星大戏院（电影院）当Boy。当时我父亲在这家电影院的经理家当炊事员，我能在这戏院当Boy还是经父亲要求后，经理“开恩”给予我家的特殊照顾。当Boy是穿着白制服在电影院开场前和中间休息时叫卖饼干、糖果、冰激凌等食品。那时，上午戏院不开门，只下午、晚上放电影，所以我下午、晚上才去戏院。这个戏院有时放电影，有时也演歌舞剧，当时黎锦辉主办的明月歌舞团也曾在这里演过“葡萄仙子”、“小小画家”等歌舞剧，那时王人美等演员都只是十多岁的女孩子。不论是放电影或演歌剧，我都可以进去看看。当年人们对Boy是看不起的，被视为下等人，因此在我自己的思想里也觉得干这一行很寒碜，特别是碰到住在我家附近的熟人来戏院看电影时，我就躲开他们。那是1928年的头几个月。

由于我对在百星戏院当Boy总觉不是滋味，到1928年的四五月，我哥哥的一个高小同学介绍我到闸北顾家湾铸丰搪瓷厂当练习生。这是我的第四个职业，那时我还不到15岁。这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工厂，有400—500个工人，生产脸盆、茶缸等搪瓷器皿。我的介绍人是老板的内侄，我进厂后老板让我在美工车间描图兼管女工的计件工资帐目。描图就是把美术人员设计出来的图案，分色复制描在纸上，又把这些纸贴在铁坯上，再把花缕空，将铁

坯套在白脸盆外面或里面，用法琅粉喷上去，然后在炉上烤，白脸盆就成了花脸盆了，各种颜色的脸盆需要这样分别套色多次。女工们干的是计件活儿，我完成描图的活儿以后还要为他们计帐，就是每天把每个女工做了多少件活儿记下来，月终时再算出每人每月得多少工资。描图的工作我开始觉得新鲜有趣，干久了也难免感到有些枯燥，但这毕竟是我干过的几种职业中的最好的工作。此外每天、每月为女工们计算工资的多少，这件事还使我开拓了生活的视野，从女工们收入的不同工资数字中，也多少了解、感受到一些工人姊妹生活的甘苦。

铸丰搪瓷厂是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工厂，厂里还为我们练习生办了一个业余补习班学习文化。由于我已饱尝了过去三次学徒生涯的艰辛，所以对当时这份得来不易的工作倍觉珍惜，同时也开始知道掌握文化的重要，自知今后要做好工作，还得更努力地学习。所以我当时学习是比较用功的，在三年半的时日中，文化程度提高较快，工作也认真负责，因此三年练习期满后就被提升为职员。在这期间我认识了王尧山，他是厂里的职员，很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

在铸丰厂当练习生时，第一年每月得津贴1元钱，第二年每月2元，第三年3元，伙食由厂里供给。当职员每月起薪是14元，但要用掉伙食费7元，比当练习生也只增加4元钱的收入。当时我已有家庭负担，因父亲又一次失业，哥哥的收入也很少。为补贴家用，减少父母的困难，我将每月的收入除去伙食费全部交给家里。

这家搪瓷厂在1928年后的二、三年里打开了南洋群岛的销路，业务发展很快，还在新加坡开了分店。于是就扩充股份，添置生产设备，还办了分厂，又招了些工人、职员。但到1929年，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南洋的销路突然减少，国内销路因竞争较激烈也减少了，于是就先将一个分厂停办，裁减了不少职工，这

样就酿成了工人罢工。经过两次罢工之后，工厂更是一蹶不振，我看到这种情形，不由得产生了另谋出路的想法。1931年9月我就去报考生活周刊社。

考进生活周刊社

大概在1929年或1930年，铸丰厂招进了一批中华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其中有一个姓景的同事，是安徽人，和我比较谈得来。在宿舍里他经常讲些中华职业学校的事，还谈到他的英文老师邹韬奋的情况，说邹先生教书如何严格，对学生如何循循善诱，考试如何铁面无情。有一个学生功课很不好，不能升级，他的家长托校长说情，可是邹先生却不买帐，严格执行校规，坚持这个学生不能升级，否则他只有辞职不干。这一类关于韬奋的故事，从那位姓景的同事那里听了不少，不由得对韬奋的为人顿生敬仰之情。后来又由景介绍订阅了一份《生活》周刊，每期必读，更增加了对韬奋的道德文章的敬佩和喜爱。

1931年是世界经济危机十分严重的一年，铸丰厂在南洋一带生意也大受影响，在厂的工人经常罢工，生产极不正常，厂里开始裁人。正在我惴惴不安，恐怕饭碗不保的时候，《生活》周刊8月15日出版的第六卷第三十五期刊出了招考练习生的广告。这时，尽管我在铸丰厂已当过3年练习生，并已升为职员，由于对韬奋先生的敬佩之情，还是毅然去报考。9月初的一天，我到华龙路环龙路生活周刊社去参加考试。考试的题目并不繁难，先是笔试，只写一篇自述，此外还作一些常识、珠算的试题。笔试后，又进行口试，是由邹韬奋先生和徐伯昕先生亲自和我谈的，他们很和蔼地向我询问了一些关于我家庭、生活情况和学习经历方面的问题。

几天以后，生活周刊社给我来了信，说我的考试成绩是挺不错的，但因限于名额而未能录取。这一下，真把我惊呆了。本来我是瞒着老板偷着去应试的，这封来信却不知怎么被老板的一个亲戚知道了，因此我心里很不安，担心生活周刊社去不成，反而会被搪瓷厂借机将我辞退。于是我立即写信给生活周刊社诉说我的难处，要求他们允许我参加生活周刊社的工作。不几天，回信来了，这是一封字体工整、笔迹清秀、意词亲切的来信，意思是同意我去工作。后来知道，这封信是当时任韬奋秘书的黄宝珣写的。我就这样如愿以偿地考进了生活周刊社，离开了搪瓷厂。1931年9月18日去生活周刊社报到，这是我的第五个职业，从此开始了我的新生活，这也是我一生的转折点。

当时生活周刊社是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一部分，职教社的负责人是黄炎培先生。就在我报到后，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黄炎培先生来向大家报告：日本帝国主义入侵沈阳！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大家都义愤填膺，并纷纷议论。日本帝国主义妄想侵略中国，蓄谋已久，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已赤裸裸地表露了他们侵略野心。后来还知道，这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执行不抵抗政策，置民族、人民存亡死活于不顾造成的恶果。

在这以前，我虽受到过一点爱国教育，但所思所想，都还是围绕个人问题打圈子。但考进生活周刊社后，从这9月18日报到的第一天起，受到了一系列实际的、活生生的抗日救亡教育。我思想上也就坚定了要在这新的岗位上，为抗日救国作出贡献的志愿与决心。

和我同时考进生活周刊社的还有张锡荣、薛迪畅、杜国钧（谷军）和王永德。除王永德已早去世外，其他4人均健在，并且都在北京。我们现在还常一起参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的老同志联谊会的活动。1992年北京三联书店老同志联谊会还为我们举办了参加书店60年的庆祝活动。